

# 一種死亡，多種面貌？三位無差別殺人案件倖存者的「了結」過程

周愷嫻 李茂生 吳建昌

**研究目的：**以無差別殺人死亡事件中的被害人或其家屬的對象，歸納此類似高度不明確性犯罪事件本質、「了結」的個體認知需求及導致死亡重大事件之差異，試圖提出一個探索性的分析框架，瞭解倖存者如何「走出」事件，返回社會生活。**研究方法：**訪談無差別殺人死亡案件中的三位倖存者，取得口述訪談內容，進行分析。**研究結果：**本文分析發現無差別殺人死亡事件中的倖存者通常以明確化事件之人時空性作為「了結」本次事件的認知根據，但又因為此類死亡屬於公共事件，其解答屬於一種「開放的腳本」，除倖存者外，也與司法、媒體、官方與其他人共著，後者成為倖存者「了結」本次事件的障礙。**研究結論：**無差別殺人死亡事件倖存者的了結認知歷程以去除不明確性為主，但因死亡被公共化，常超越個體可以控制的解釋範圍，真相的了結具有浮動性。

**關鍵詞：**無差別殺人被害人、被害者學、死亡、倖存者、了結

---

周愷嫻：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特聘教授；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博士；專長領域與研究興趣為犯罪學、少年犯罪。

李茂生：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日本一橋大學法學博士；專長領域與研究興趣為刑法、少年事件處理法。

吳建昌：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副教授；美國哈佛大學衛生政策博士；專長領域與研究興趣為精神醫學、司法精神鑑定。(通訊作者：E-mail: ccwu88@ntu.edu.tw)

收稿：2021年7月28日；接受：2022年1月6日

## 一、緒 論

親人死亡或個人瀕死經驗，每個倖存者 (survivors) 均會遭遇悲傷、失落、驚恐等情緒，時間長短不等的創傷，以及可恢復或無法恢復的損害，但除了情緒、創傷與損害外，我們似乎忽略了人類的「認知」需求，特別是倖存者對於死亡與瀕死事件「了結」或「落幕」(closure) 之認知需求。死亡，雖是人的必然，但不同於戰爭、疾病、自殺、認識者殺人（如家暴殺人）等死亡事件，有些死亡之因可能終身找不到答案，無差別殺人案件就是其中之最，他們的倖存者，即使有嫌疑人，也常無法從司法、警察、嫌疑人中找到解答，更不能請死亡的人提供答案。人類預期中的生活秩序感，如同積木一樣，一塊一塊在人生裡慢慢拼湊起來，看似均可以在自己決定的範圍內完成。但一件突發且莫名所以之殺人死亡事件，可以瞬間踢散這個積木作品，失去秩序感、自我操控權，也不知道重拼後，還可以預期其穩定性。對於這一群倖存者，如何在「不解的被害經驗」中，滿足其「了結」死亡之認知需求，理出一條未來的「活路」？

研究犯罪死亡之被害人及遺屬（下稱「倖存者」），不同學術領域探求的範圍不同，如：輔導諮商學多處理悲傷、病態情緒（蘇洵慧，2020）；精神醫學多處理心理創傷（Park, 2013）、法律處理損害補償、被害人保護自己的責任（廖晉賦，2009）；犯罪學處理加害人的養成與動機（Rosenfeld, 2014；Salfati and Canter, 1999；李茂生，2016；許春金等，2016；許福生，2016；周愷嫻，2016；吳建昌，2016；吳臺齡，2017；周愷嫻、李茂生、吳建昌，2017）、被害者學處理被害人的責任與特質（Daigle, 2018）。

「犯罪被害者學之父」(victimology) Mendelsohn(1976) 總結情境與個人特質，針對需為犯罪事件負責程度，將被害人分為六類：無辜、責任輕微、與加害人相等責任、需負起比加害人更大責任、需負起完全責任，以及誣告的被害人。這是第一個明確將犯罪被害人為對象與分類的研究。von Hentig(1948) 採用被害人的生理、心理和社會因子分類法，指出被害人常具 13 種特徵：年輕人、女性、老人、移民、少數族群、精神病患、智能障礙、寂寞者、性喜虐待他人、個性囂張、貪心、憂鬱，或

自行招致危險處境者。他的研究後來就成為「被害特質論」的一部分。Schafer(1968)將 Mendelsohn 和 von Hentig 整合後，主張每個人都有義務採取避免犯罪發生的預防措施，根據被害人為犯罪事件負起責任程度，可分七類：無關係者（免責）、挑釁者（共同分擔犯罪責任）、心理脆弱者（輕微責任）、生理脆弱者（免責）、社會脆弱者（免責）、自行招致者（負全部責任）、政治受害者（免責）。我國的法律學者也將前述被害者學應用在詐欺案件中被害人是否應受到刑法的保護（廖晉賦，2009），他指出通說是詐欺被害人的確陷於財產處分之錯誤，不應為案件負責，但也有少數學說認為若被害人有效的自我保護是可能或可期待的，嫌疑人就不存在有足夠的社會危險法益侵害（廖晉賦，2009），他所謂的「少數說」符合早期被害者學的論述。

1960 年代之後的趨勢，以分析被害人與犯罪事件的關係分為三大學說：第一是被害特質論 (victim precipitation theory)<sup>1</sup>，此論認為被害人具有某種特質，易被犯罪人辨識出來，也易成為犯罪被害人。第二是生活模式論 (lifestyle theory)，此論認為被害人正好與犯罪人有重疊的生活模式高度重疊（如毒品、賭博、幫派人口），故其被害機率也較大。第三是危險地區論 (deviance place theory)，此論認為被害人把自己暴露在危險區域或地點中（如門窗未鎖），易成為被害人 (Daigle, 2018; Shoham et al., 2010)。

綜上，1960 年代之前與之後被害者學之分類工作，無非為犯罪被害行為或被害人找到一個「解釋」，這個「解釋」，一方面有其法律訴訟時被害人的刑事責任分擔基礎，一方面是被害預防，但兩者均對被害人給予了價值與責任判斷，但對於存活者，也許過於沉重。且所有的被害者學分類，幾乎很少從存活者角度，瞭解被害人如何「理解」或認知被害過程與理由，故難使存活者釋懷或對事件作一個終結，回到對陌生人保持一定信任的社會生活。

當代被害者學主流則是被害心理創傷與復原議題，研究顯示暴力犯罪被害人雖有個別特徵差異，但原則上均有三段復原期：一，處理事件初發的身心生活影響，如急性壓力失調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受虐婦女症候群、性侵害創傷症候群，遭

---

1 Victim precipitation theory 過去在臺灣通譯為「被害促發理論」，唯本文審度英文與理論內涵，認為宜採用「被害特質論」，且可與 victim facilitation( 通譯亦為「被害促發」)區隔。

受跟蹤騷擾症候群等；二，嘗試修復自我；三，返回正常生活作息 (Neff et al., 2012; McGrath, 2014; Tsong & Ullman, 2018; Gillespie et al., 2019; Bhuptani et al., 2019)。其他豐富的倖存者傷痛與療癒過程的非學術性書寫，也很貼近以第一手口述方式道出倖存者的痛苦、傷口、孤單、焦慮、寬恕等情緒與創傷態樣（社團法人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2016；徐璐，1998；小林美佳，2010）。

另一個被害人研究的主流議題是悲傷。學者 Kubler-Ross(1970)早在五十多年前，就觀察到在病房裡，病危或病逝者的家屬，都會經歷過的過程。她將觀察到的家屬所經歷悲傷與失落 (grief and loss) 歸納為五階段調適過程：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接受。第一階段否認事實或想獨處，就是無法接受發生之事，甚至覺得事情弄錯了，往者不是自己或親人，往者尚未死亡或離去。第二階段，對加害人、親人之憤怒，指責可能的引發事件的人，甚至指責往生者，為何提早離開。第三階段，與命運討價還價，常常假設「如果早知道，當時可以……就不會……」。第四階段，憂鬱沮喪期，一方面悲傷與後悔，一方面擔心後來的生活無著、頓失依靠，實務上的擔心會一一浮現。另一種沮喪是在心中悄悄的準備好，親人已經離開的事實。最後一階段，則是接受事實，不是每一位面對失去親人者均會經歷這個階段，有些人終身無法到達接受事實的階段。Kubler-Ross 的研究太經典，幾乎無後人可超越。

死亡病人的親友與家屬，雙方熟識且經過多年的相處，悲傷與失落五階段是建立在過去彼此保存的記憶與當前永遠分別的痛苦上，但無差別殺人的存活者，與加害人從無過去生活型態重疊，也無情感或記憶的交纏，且此類事件案發地通常為公共空間（如鐵路、捷運、馬路、商店等）與白日時間，卻以隨機無故的方式，發生了驟然被迫與親人永久分離的結果。況且病人去世，若非名人，可免媒體或網路的反覆報導騷擾，但無差別殺人之被害人或其家屬的眼淚，以及法院的判決，均可能受到網路永恆的報導與印記，可能被多次以專題的文字或影像方式留下足印<sup>2</sup>，犯罪存

2 有關臺灣特殊犯罪事件的報導，諸如有些媒體以「臺灣十大殺人案件回顧」、「2015 年臺灣十大惡極殺人魔」、「回顧臺灣十大滅門血案」為標題的專題報導，即便有些事件已經經過二十多年，被害人與事件的細節仍被重複而詳細的流傳。前述報導請參閱相關連結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53639>（最後擷取日期：2021 年 7 月 7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221000813-260603?chdtv>（最後擷取日期：2021 年 7 月

活者在整個事件中，均為被動者，也無從主動參與這些報導，使死亡既驟然但又永久。因也此，僅處理存活者的「情緒」，無助於對事件或創傷產生有「意義」的理解(Park, 2013)或得到明確的答案。Kubler-Ross 的悲傷五階段，適用無差別殺人的存活者「認知」，容有諸多無法填補的空白。

至於，為何自己或家人成了犯罪被害人？這個問題也可在歸因理論中找到一些文獻。學者 Littleton 等人(2007)以後設分析方法(meta analysis)，比較了 17 個實證研究，發現三種創傷性侵害被害、重病、意外重傷三種創傷的自我歸因(如：都是自己的錯、自己造成的)並無顯著差異，也就是說，不論是哪一種事件，被害人基本上都不會歸罪於自己，且創傷事件持續的時間愈長，自我歸因的程度愈低。如果不歸責為自己造成，那麼要責備誰呢？Littleton 等人又比較外在歸因的差別，(如：都是別人的錯、運氣不好、外在環境的錯等)，卻有一些顯著差異，其中，性侵害被害人較少歸因於「運氣差」，更會歸責於「別人」的錯(如：加害人)。Littleton 等人的研究，讓我們更進一步瞭解不同的重大事件中，自我歸因均非典型對創傷的反應，犯罪被害人更傾向於歸因於別人(或加害人)。

還有一類被害人研究，落在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的社會服務需求。鄭瑞隆與王世文(2014)以問卷分析 144 位犯罪被害人家屬，並訪談 5 位被害人家屬，這些被害人以車禍死亡案件最多(佔約 40%)，其次是暴力死亡案件(32%)。他們的研究發現，被害人家屬前五大服務需求 83% 希望法律協助，78% 希望申請補償金，75% 希望能夠調查加害人的財產，60% 需要社會救補助。但這五項服務滿意度均非最高，法律服務的滿意度是八成；申請補償金者有六成，雖有近一半獲得補償金，但有 51% 被害人家屬表示不滿意。24% 家屬得到加害人賠償，但 81% 家屬表示不滿意。這個研究讓我們很清楚得知犯罪被害人家屬的「外在」需求為何。

前述有關創傷、人格、悲傷、服務需求研究豐富，但因為沒太過多文獻指出無差別殺人犯罪與一般暴力犯罪倖存者的差異，研究視角、輸送服務，法規及服務實務上，多半被一視同仁，「平等對待」<sup>3</sup>。唯一般殺人行為的「介面」涉及至少兩

---

7 日)、<https://news.tvbs.com.tw/local/955050>(最後擷取日期：2021 年 7 月 7 日)

3 請閱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30 條內容。



造當事人，除了加害人動機外，增加了被害人的位置，或許更能看見「行為」中，兩造當事人成為事件或行為中「人」的立體「參與性」或「互涉性」(Rosenfeld, 2014)。因此，若從殺人者與被害人之間的關係進行分類，認識者間殺人或陌生人間殺人的分別，本質上涵蓋了兩造當事人或深或淺、或長或短、或有或無的情感關係，以及平日的生活重疊痕跡。但幾乎全部無法適用素不相識者殺人事件之倖存者。

## (二)倖存者「了結」之認知需求

Kruglanski 等人 (1993) 年曾經提出過「落幕」(closed-mindedness) 的心智開關概念。Kruglanski 認為個人對未確定性有其忍耐限度，每個人都期待找到解答，關閉相關事件的心智開關，順利「落幕」，若無法找到解答，超越了個人可以忍耐的不確定性，也可能會引發內在心理焦慮，難以回到正常生活軌道 (Berenbaum et al., 2008)。

Kruglanski 提出五個「落幕的心智開關」測量方法：(1) 想要找到秩序感的程度，(2) 解答疑惑的內在驅力程度，(3) 渴望作一個最後決定的程度，(4) 期待自己所知是穩定，不會隨意變動的偏好程度，(5) 想要盡快找到答案後可立足生活的期待程度。對未知或不確定事件的答案最終可否「落幕」，都取決於每個人在五個心智開關上的差異。Kruglanski 的「落幕」概念，某種程度解答了很多不明確因素中，執意尋找答案的倖存者認知狀況。落幕的認知需求，因人而異，也可解釋為何有的倖存者，得以在一定時間內回到正常生活，有些則可能焦慮憂鬱，甚至長期破壞了常態生活。

1994 年 Kruglanski 和其他學者 (Webster & Kruglanski, 1994)，進一步提出了「了結」之認知需求 (the need for closure) 命題，這個命題，超越了前過去的「落幕」概念，試圖概化多數人對於重大不明事件的共同認知需求，更精準的說明常人對於明確答案的認知需求，也似乎更貼近本文探討的重點無差別殺人倖存者找尋事件「答案」的認知過程。

經過後續學者多次修訂版本 (Neuberg et al., 1997; Roets & van Hiel, 2007; Roets & van Hiel, 2011)，發展出短版 (11 題) 與長版 (41 題) 的「了結認知需求量表」 (the need for closure scale, NFCS)，測量的核心概念有五項：秩序感 (the need for order)、

可預測性 (the need for predictability)、自決性 (decisiveness)、避開模糊不清的傾向 (avoidance of ambiguity)、落幕感 (closed mindedness)。這些概念測量每個人對於不明確性的忍受度、對於一個問題可能有多種答案的忍受度、對於團體裡獨排眾議者、出其不意者的忍受度、以及做決定後可鬆一口氣的需求感等。量表評分結果得分愈高，愈是不能容忍不明確性者，對於「了結」的認知需求愈高。

Kruglanski 等人 (1993) 以降認為人面對重大事件，認知上必然期待能排除疑惑或模糊，得到一個明確答案。當然，人也可能因各種因素而刻意選擇逃避明確的答案。獲得明確答案涉及每個人對事件之成本與效益的評估，如了結一樁事件可以獲益的話，人會傾向於找到明確答案，但若明確答案的代價太大，則可能選擇逃避獲知答案。找尋答案的代價，可能有過渡消耗認知動能 (cognitive energy)、可能會做出錯誤決定的風險、或因為知道答案後減少了選擇的自由等 (Webster and Kruglanski, 1994)。以無差別殺人案件倖存者而言，事件為何發生？為何選中自己或親人？根據上開研究學者的相關論點，在無差別殺人案件當中的倖存者，為了能夠了結，本文認為可朝向三方向探究，亦即每位倖存者獲得此問題明確答案之需求，顯然也需評估收益與成本。倖存者要找到答案，其收穫可能是 (1) 在法律上與心理上，重新確認被害人或自己對死亡的免責，(2) 重新找回事物與生活的秩序感、可預測性、避免模糊等積木，(3) 重新獲得秩序的掌控權，順利落幕本事件。諸如戰爭、自殺、疾病、意外、家人間弑殺或幫派相刃的死亡事件，或可循序找到解釋 (或至少可以接受的解釋)，了結本次死亡事件。

一個不易明確化的隨機殺人事件，且通常為社會重大治安事件，「死亡」必然被媒體、司法、官僚體系公共化處理，非家屬的私人事務。此條件下，個體若有強烈的了結認知需求，也無法解決以下問題：(1) 隨機殺人，未必能找到殺人動機、選定被害人或犯案時間、空間的理由；(2) 假設犯罪嫌疑人也曾遭受重大創傷或為身心疾病所苦，存活者面臨道德上難題，恐失「萬惡殺人魔」vs「無辜倖存者」的簡單「二分法」身分；(3) 法院審理時間甚長，判決結果非自己所能掌控；(4) 媒體與網路傳言誤差甚大，官僚體系的官式關懷協助、親友無盡的好奇探詢，倖存者受到的探詢愈多、官式關懷愈多、搜尋閱讀訊息愈多，愈難釐清真偽與脈絡，反而可能使得自

己或家人成為報導、傳言、轉述、記者會中的「客體」。基於前述因子，要得到真相解答，除了個體之認知需求之外，司法、媒體、官僚體系共創的「答案」也是倖存者難以自我決定之重。

### (三) 倖存者如何理解無差別殺人事件中的「死亡」？

不論是病亡或犯罪被害死亡，均會共享一些對死亡同樣的悲傷與失落。但人類死亡的終局雖然一樣，卻有著不同的「死法」與理由。為了瞭解無差別殺人案件倖存者的「了結」認知需求，本文先比對此類死亡案件與其他重大死亡案件的差異。表1是本文對「死亡」事件與「死法」的分類論框架，主軸是「死亡」的各種確定性，因為確定性不同，對於個體對生命的秩序感、可預期性與操控權造成影響不一。

表 1 死亡事件的「人、時、空」確定性的三維度

重大死亡 類型	歸責	人		時間	空間
		加、被害人 關係	遺屬與 加害人關係		
疾病致死 事件	自然	無加害人	無加害人	長短不等的一 段時間	確定(如醫院 或居所)
戰爭	敵軍	敵對國家或 組織關係	透過國家或 組織建立的 敵對關係	具有期待可 能性的確定	具有期待可 能性的確定
自殺致死 事件	自殺者	互為加、被 害人	熟識且親密	不確定	不確定
意外致死 事件	自然	無加害人或 陌生人	無加害人或 陌生人	不確定	不確定
暴力犯罪 致死事件	加害人或/及 被害人	多屬認識 者，少數陌 生人	認識或陌生 人	不確定	不確定
無差別殺人 事件	有責、部分 有責或無責 的加害人	陌生人	陌生人	不確定	不確定



對比無差別殺人死亡事件的不確定性，表 1 提出其他五種重大死亡事件來比對差異，分別為疾病、戰爭、意外、自殺、一般暴力犯罪。本文認為六種死亡事件，可以以三個維度的「確定性」來區分；人、時間與空間。例如：因病死亡，雖然生命操縱在大自然，但至少無可歸責的加害人或具有時間、空間的可期待確定性。戰爭而亡者，有不特定的敵人或敵國為歸責對象，戰時與戰區仍為具有可期待性的死亡發生時地。自殺死亡者，無明確的時間或空間，但被害之死者無為責難。意外死亡事件中，通常難以期待有明確的時間與空間，但可能無加害人或加害人無意造成，容有責難或獲得答案之可能性。一般暴力犯罪死亡，時間與空間也無確定性，但不論是否破案，必然有具有犯罪動機的加害人，可以找到歸責之人或事由。對比之下，無差別殺人犯罪的死亡，時間與空間不確定，雖必然有加害人，但不論破案或定讞與否，若加害人不具或僅具部分刑事責任能力，倖存者可能永遠無法獲得犯罪動機之答案。

除此之外，六種事件中，疾病、意外、自殺的死亡，通常屬於「私人事件」，但是戰爭、一般殺人犯罪及無差別殺人犯罪的死亡，是「公共事件」。戰爭之亡，國家會製造一個死亡的公共故事版本，死亡者成為英雄，倖存者獲得撫卹，使倖存者得以了結該起死亡事件。熟識者殺人被害之亡，死亡者未必是英雄，甚有諸多不為外人所道之錢財愛恨情仇等之人間塵瑣碎事，通常由司法給予一個死亡的公共故事版本，媒體不見得會轉述，而倖存者一般也期待速速了結。但無差別殺人被害死亡，被害人既不是英雄，也非自行招致，與加害人素不相識，倖存者充滿了疑問，恐怕連犯罪人或其家人也充滿了疑問。這個死亡的公共故事版本，僅剩下司法可以透過合法權威來撰寫，官僚體系負責關懷道歉善後，再由媒體（或各種民間相關團體）負責增添文字影像色彩。倖存者對死亡的了結認知，除個體自己外，還有司法、官僚、媒體的共同參與，要了結不易。這是 Kruglanski 等人僅討論個體認知差異時，未思考到的特定議題面向。

綜上，本文以無差別殺人案件的三個不明確特性，提出「秩序感、可預測性、自決、避開模糊、落幕需求」五了結概念，又因為涉及冗長的司法審判與不確定性，即便倖存者不再在乎審判量刑結果，也很可能在審理期間，無法「置身」在司法與

媒體之外。這個一個探索性的分析框架，本文借用三位無差別殺人倖存者（一位當事人、兩位死亡者家屬）訪談口述內容，比對適配度。

## 二、研究方法

### （一）訪談倖存者

犯罪倖存者的姓名或聯絡方式，因受個人資料法規保護，無從取得。又因案件屬性為無差別殺人，加害人不認識被害人，也無從自加害人口中或公開判決書的查詢得知被害人相關訊息。本文取樣最大的困難在此。唯一能夠接觸到倖存者，特別是重大犯罪倖存者的機關（構）是法務部保護司以及其督管指揮之犯罪被害保護協會，根據法定職責，他們需在犯罪發生後，提供被害人及其家屬相關的協助與服務。本文遂透過犯罪被害保護協會之聯繫，徵詢經歷此類死亡案件且願意接受訪談之倖存者。經數月時間，終徵得三名成人倖存者同意受訪。訪談後，本文透過網路查詢司法院判決書，用以該案基本資料並對照受訪者之口述內容。

表 2 是三位受訪者之基本資料。訪談時間均為 106 年，訪談時間約兩至三小時，受訪次數均為一次。因距離該案已經多年，其中受訪者 V3 案發時間與受訪時間相隔 12 年。案發地點均為公共場所，時間為週間白日。案發期日至法院定讞期日至少均超過兩年。口述過程中，多年前的傷痛與驚恐，讓三人多次無法克制眼淚，其中兩名受訪者曾經在案發現場，更是自陳多年噩夢難止，猶見記憶刻痕，且餘悸仍存。受訪時，第一位與第三位已經轉移生活重心，不再刻意關切類似案件，也有自己的生活，從生理、心理、社會面向而言，可以認定為「了結」者，第二位受訪者的生理與心理狀況，是否已經「了結」，本文尚難判斷，姑且認定為「暫時了結」者。

本文樣本僅三人，人數甚少，但如前所述，本文花了許多時間，在被害群的「大海」中尋覓無差別殺人案件倖存者，惟此類案件本屬罕見中的罕見，加上被害人受到國家法規之保護，極難尋覓，終究在官方協助下，找到願意分享被害歷程者。在缺乏資料、文獻、理論認識的前提下，本文進行探索性研究，目的並非驗證假設，而是借用三人的口述內容提供初步的認識與瞭解無差別殺人案件倖存者「了結事件」

表 2 受訪基本資料

受訪者編號	V1	V2	V3
受訪者			
與被害人關係	配偶	本人	子女
是否目睹	事後得知，未在現場	在案發現場	在案發現場
性別	男	女	女
發時年齡	50-60	40-50	15-20
案發時教育程度	高中	大學	高中
案發時職業	工	教	學生
事件特徵			
案發地區	北部城市	北部城市	中部鄉村
案發地點	公共運輸系統	公共運輸系統	家中自營商店
案發年(時段)	103年(下午)	103年(下午)	94年(中午)
與被害人關係	陌生人	陌生人	同社區陌生人
被害人特徵			
職業	自營商店幫忙	同受訪者	自營商店老闆
年齡	50-60	同受訪者	40-50
性別	女	同受訪者	男
司法審理			
定讞時間	105年	105年	98年
判決結果	死刑	死刑	無期徒刑
訪談資訊			
地點	辦公室	住家	辦公室
日期	106年9月18日	106年8月21日	106年8月31日
	上午10-13:00	下午14:00-17:00	下午14:00-17:00
訪談者	2名研究人員	2名研究人員	1名研究人員

的過程。三名受訪者也許樣本非常小且無法代表所有類似處境的倖存者，但非常稀有而珍貴。

## (二) 訪談大綱

本研究訪談重點是已經死亡之被害人遺屬或受到重傷之被害人對案件感受與看法，訴訟過程經驗、未來期待。本文訪談大綱如下：

1. 對事件的認知：加害人之動機、加害人犯罪手法（使用武器、攻擊方式、地點選擇等）、被害人數、加害人酒藥使用、精神疾病與動機等。
2. 對被害發生原因之解釋：被害人弱點、情境、日常活動、當天狀況（靜態、動態）等。
3. 對案件之感受：情緒反應、對訴訟過程看法、對刑罰看法、對加害人、被害人及社會看法；期待加害人或社會反應；是否或何時原諒加害人。
4. 其他與被害人行為理論相關之資訊。

## (三) 資料分析方法

本文反覆閱聽至少三次錄音帶、逐字稿後，即可透過選擇與分類，重組事件脈絡。評估三位受訪者的記憶、口述、情緒表達能力正常，受訪者 V1 對單一問題，回應最長一句達 600 字上下，V2 可達 1,500 字，V3 約 500 字，但出現如此高完整回應句子頻率低。V1 訪談稿分析了約 593 段落，V2 訪談稿分析是 328 段落，V3 是 1,290 段落。其中受訪者 V2 的描述能力佳，可完整回答一個簡單問題，受訪者 V1 中等，受訪者 V3 較為話語較少，回應簡單，需以更多問句提示，也是段落數較長之原因。

編碼是訪談內容分析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本文編碼人員三位，具醫學、犯罪、法律之專業，且獨立為之。重組後內容，也經三位編碼者交叉確認分類與詮釋之適當性，編碼有差異時，以討論獲得共識。編碼程序分為三層，第一層為開放編碼，第二層主軸編碼一，以本文提出有關事件「不明確性」如何在認知上被明確化為框架歸納。第三層，以五概念「秩序感、可預測性、自決、避開模糊、落幕」等分類了結之認知。第二與第三層次交錯後，得出無差別殺人倖存者對於事件的了結認知過程（請參閱表 3）。

表 3 本訪談資料的編碼層次

開放編碼關鍵字	主軸編碼1 (不明確的來源)	主軸編碼2 (了結的向度)
如：剛好、剛剛好、早一分鐘晚一分鐘	時	秩序感、可預測性、自決、 避開模糊、落幕需求
如：逃不出、每日經過	地	同上
如：就不回來也好、為了救別人	與被害人	同上
如：有病、要死自己死	與加害人	同上
如：不通知、不知道	司法	同上
如：犯保	官方機關	同上
如：新聞、民間團體	媒體(或民間團體)	同上

#### (四) 研究倫理

本研究於 106 年 2 月申請臺大醫學院研究倫理委員會，經過審查後，同意本文對此易受傷害群體（被害人及其家屬）進行質性訪談、相關檢測、資料蒐集。

因倖存者屬於易受傷害族群，在進行訪談時，本文對於匿名隱私、法律權益、風險及補救措施、知情同意等均事前考量。訪談時，倖存者繫屬司法案件已定讞多年，訪談內容不會影響該案定罪量刑。又因訪談資料不會揭露案件細節與犯罪人相關資料，故若日後若有其他任何司法救濟，也無從勾稽與本訪談內容之關係。文獻顯示被害人回憶重大創傷事件，可能引起情緒痛苦、夢魘、自責、自殘，甚至自殺等風險，故在受訪前，作者明確告知此風險，訪談也以循序漸進方式，由熟悉無壓力主題慢慢切入。過程中，未曾有受訪者發生情緒或其他精神疾病困擾。訪談後，也未發覺受訪者需接受臨床協助必要。

### 三、研究結果

本研究訪談了三名倖存者，一位為直接被害人，兩位是被害人家屬，兩位家屬之親人均已死亡。被害人學歷無特別之差別；性別是兩位女性、一位男性；案發時



職業分別教師、無薪自僱者、小商店老闆；發生地兩名在公共運輸系統上，一名在自家開設小店內，且均在一般上班日的白天。被害人特質無太大相似點，但倖存者對事件反應確有共同處，如：對事件如何或為何發生疑惑不解、自責或失落感、對加害人或制度的憤怒、媒體帶來的二次傷害，經歷過各種情緒、創傷後，訪談時因為已過數年，倖存者能夠逐漸恢復正常生活以及與社會關係連結，但現場目睹者，潛藏了更長期與深入的恐懼不安。

本文分析受訪者對於案件的「了結」認知過程，結果如下：

### (一)以「剛剛好」，解除時空不確定性

無差別殺人案件倖存者，對於事件如何發生或為何發生，一開始都表示震驚、意外與疑惑不解，被害人當日當時當場均只是正在進行日常例行活動（搭車或工作），完全無法預期事件的發生，家屬亦無前兆與警訊，故事件發生或獲知時，充滿疑惑不解。

「（被害人）幾乎每天都要外出啦<sup>4</sup>。嗯。只是說那天真的運氣很不好，在回程當中……。對，碰到這個偶發事件。……為你剛好就在那個時間點，就像山崩好了，你就剛好在那個時間點，大石頭砸下來，就是你啊，就是很多事情是命定的，不是說你怎麼樣。」（V1\_33, V1\_34, V1\_36, V1\_288）<sup>5</sup>

「……怎麼那時候下午2點多還送她去坐車，也不可能說那時候搭，怎麼一剎那之間就發生這個事情，根本沒辦法接受。」（V1\_299, V1\_358）

「就像平常這樣過，只是那一天我特別有種感覺是不想出門、不想去，因為那天剛好上到上午天氣都還好……，很多事情就是剛剛好，我覺得後來有去想這些事情，我們有時候都說，如果差一分鐘，如果什麼，可是就是沒有如果，因為就是剛剛好才發生這個事情。」（V2\_158）

---

4 訪談稿的粗黑體字，是作者自行標示，代表第一層次開放編碼的關鍵字。

5 括弧中為第一組為受訪者編號（如：V1, V2, V3），第三組為逐字稿行號編碼，如\_XX表示引自該訪稿的第xx行。以下均同。

「就是所以我剛剛說其實在回顧的時候也會想說，如果怎麼樣就是晚一班車或早一班車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可是在佛家講的就是什麼事情都已經定好的，就是那個時候，就是剛剛好。」(V2\_193)

「……那天他是直接衝進來……因為剛好我們家櫃子可能在這邊，然後這就是我們只有一個出入口，就煮菜跟結帳都在這邊，然後電話都在這邊，我們就一個出入口很方便，這邊就冰箱，然後這邊就大門口，然後這邊就桌椅，然後這邊有個圓桌，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剛剛好那時候，……我爸媽是剛好是往外，往這邊走，可是我們只有一個出入口，他也就直接衝進來……一定想往外逃，可是他衝太快，因為我們家的家門在這裡，他們也逃不進去，因為這剛好做在這邊卡到……反正就是沒有地方逃就對了……」(V3\_433-V3\_441)

綜合前述口述內容，對於時空不明確性，倖存者不約而同的以「運氣不好」、「逃不掉」、「無處可逃」、「(人生的)剛剛好」、「(被害人的)剛好」來解讀或去不明確化。雖然運氣或剛好仍是無可解釋之事，但可使得倖存者重新賦予該死亡事件時空的秩序感。惟此種感受，仍與倖存者本身認知需求之強弱有關，例如，上開受訪者陳述，第二位表達了最強烈的需求，對事件、犯罪人、犯罪人家庭、其他被害人、媒體、法院都提出諸多想要深入瞭解的好奇及疑問。

倖存者詮釋「剛剛好」，是一種重新恢復時空秩序的認知過程，頗為符合Kruglanski 五個「落幕的心智開關」的第一項「想要找到秩序感」，也與第四項「期待自己所知是穩定，不會隨意變動」有關。

## (二) 以「解脫」、「救人」、「自救」解除對被害人死亡的愧疚

倖存者對無力抗拒之殺人事件發生，有自責或懷疑自我能力傾向；另一方面，倖存者須待實際事務（如喪禮、生理傷口略微復原、司法訴訟等）處理完畢，才會表現出來。當然，三位受訪者的訪談來看，事件發生後從半年到一年，甚至更久，採取卸除倖存者的愧疚感最好的方法似乎是為被害人找到一個「光榮而理性」的死亡理由。

「我們看現場行車記錄器，就這麼一刀而已，她（被害人）本來可以逃過。因為兇嫌往左線走，然後我太太是在左邊，走那邊趕快跑，然後兇嫌前方有一個小女孩，一個年輕女孩，然後年輕女孩驚嚇跌倒，我太太趕快扶起來拉著要跑，結果被兇嫌刺到。……那個女孩子跌倒所以沒有刺到她，我太太就是因為要傾著把她拉走。」(V1\_231, V1\_342, V1\_344)

對受訪者 V1 而言，被害人要救年輕女生，以致於無法於逃脫兇嫌之手。

「那刀是從這裡進去，然後從這裡刺過來，刺到我的胸口，後來很痛，刀子拿起來之後，我就是這個動作，躺在地上是這樣的動作，後來我就坐起來，我就想說我不能死掉，我要很冷靜我要想辦法怎麼救我自己……那個空檔我就趕快去看我的包在哪裡，然後我就發現在前面，我就去找到然後我去找電話，然後我打了 110 報警……，因為我剛好那一年奶奶過世，我那一年有皈依，所以我就一直在念那個宗教的，我想說藉由宗教的力量就是念那個咒，然後讓自己穩定下來，我轉身就看到有一個緊急按鈕，我就一直按。……當看到他走過來我就站起來，然後他刀這樣拿下來的时候，我就是反射動作，去把他的手抓住，就是擋他的刀，然後我就是跟他講說你已經殺我 3 刀了，你不可以再殺我，就是想辦法自救……。」(V2\_137, V2\_137)

受訪者 V2 回憶中，之所以未死亡是因為「當時冷靜、自救、念咒、抵抗」，是一個勇敢與光榮的抵抗過程。

「（家人）不會談這件事怎麼來的，怎麼會變這樣，我們最會講得只會講一句慶幸當時沒有救活，我們真的講過這句。……因為失血過多，救活之後是植物人，對爸爸來說是個痛苦，不要說我們，因為爸爸是個非常愛漂亮的人，對他來說就是一個人躺在那邊，聽得到聲音卻不能動，是很痛苦的吧，對，所以我們覺得沒有救活對他來說是個解脫。」(V3\_661, V3\_663, V3\_665)

受訪者 V3 反覆「救活了也是植物人」三次，她和她的家人都以「不救活也是一種解脫」的認知，來減少倖存者的愧疚感。

為被害人死亡或重大殺人事件找理由，對照 Kruglanski 提出五個「落幕的心智開關」，本文認為符合想要找到秩序感，解答疑惑的內在驅力、期待自己所知是穩定，不會隨意變動的；以及想要盡快找到答案後可立足生活，等四項測量指標。

### (三)用「歸責他人」來解除不明動機的加害人

社會共同生活的信賴與秩序感，因為這樣動機不明的加害事件與加害人，而無可預測。如何解除這個疑惑？倖存者通常是透過司法審判過程與媒體的二手報導得到若干自我解答。

「內心上真的不可思議，真的是怎麼會有這種人，我們講句難聽點，真得要死掉就自己撞牆去死就好了啊，幹嘛要牽連這些無辜的受害，殺掉別人對不對。……根本毫認識、毫無冤仇。」(V1\_350)

「我覺得說這個人感覺上覺得一副無所謂的樣子，看他的眼神好像就那種仇恨的眼神一樣，對每一人好像是他的仇人一樣，他的眼神啦，是覺得說他自己也是受害者，就是感覺上都是好像都是他的仇人一樣。他本身就是學習過程中有一些受害，有一些內心的障礙，他沒辦法自己突破，所以說才會感覺這個人很冷漠。」(V1\_434)

V1 認為加害人自己可能也是學習過程的受害者，想拉著別人一起死，並不足以饒恕。。

「我其實自己到後來 104、105 年，我其實很想要去做一件事，就是說想要去探監，然後我想知道他的殺人動機，我想要做一個研究案。」(V2\_266)

「我覺得缺很大的是他有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像他的家人，爸爸媽媽的這一塊，他只有出來道歉，然後就不見了，就好像在這個事件整個蒸發一樣，……其實他的腦是不是也要去做一個實驗，他是不是在哪一塊、哪一個部分跟我們是不一樣的，其實他那時候他很快被判死刑，我是有一點覺得就是很快把案子結掉，就死了，其實我是覺得有一點草率。」(V2\_274)

V2 想要親自研究殺人動機，殺人者的家庭背景、人格以及腦部病變，將自己從「被害人」，變成「研究者」，將加害人的生理、心理、社會給予理性的歸因。

V3 對她的加害人歸因則是「我就真的不知道，因為當時大家說他是神經病，可是他在事發前，還有吸安，我記得大家說他事發前還有在吸毒品，有在吃毒。」(V3\_702)

「我覺得不管這個人是神經病，刑責還是要有，我真的是這樣，每個都說他神經病就飽了，每個都說有曾經就醫就飽了阿，那神經病就可以殺人？我們真的會這樣覺得，OO 也是心理有病阿，他心裡也是神經病阿。」(V3\_1210)

將殺人歸因為精神疾病、吸毒、異常人格、家庭背景、自己也曾受害、自殺殺人傾向，甚至腦部異常，都是三位受訪者「可預期」、「秩序化」無秩序感的無差別殺人者的一種認知過程，也是讓此類死亡理由成為「可預測」、去除模糊化的認知程序。

同樣的，為加害人找理由，對照 Kruglanski 提出五個「落幕的心智開關」，也符合想要找到秩序感，解答疑惑的內在驅力、期待自己所知是穩定，不會隨意變動的；以及想要盡快找到答案後可立足生活等四項測量指標。

#### (四) 死亡事件的公共化

##### 1. 「靈堂前的麥克風」

媒體報導對倖存者不但造成二次傷害，又因為網路發達，此種傷害為長期持續存在，另一方面，媒體是使得被害人死亡公共化的推手之一。倖存者對此毫無控制力。

「媒體有時候就會捕風捉影，當然有時候會過度的渲染，有時候就是沒有尊重我們受害者人的立場去想……那時候幾乎一年之間，我出門都帶著我太太的照片，在胸前用證很大，我出去玩都帶著我太太的照片，還有後面做背景，跟太太做拍照，那一年幾乎都是這樣，只要看我的臉書上去，像去 XX，去哪邊，在我社群媒體上對太太的思念，我們重回的地方都會 PO 上去。那時候不知道哪一臺就說我有一點矯情，其實我不予置評，當然我心情、我內心的難受是這樣子，那你認為我是有一點矯情，那是你個人的看法，我不予置評。」(V1\_549)

「我覺得新聞報導的負面報導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力，……就覺得新聞的渲染力很大、影響力也很大，以前可能比較封閉的社會，沒有這些渲染的話，可能後來不會有小燈泡的事件，也後來不會有背包客拿著背包，是廚師，然後刀子劃傷人的這些事件，這些模仿效應就會出現。……」(V\_292)。



受訪者 V3 事發時僅為學生，家中尚有長輩與弟妹，長輩過於傷心無法處理，弟妹年紀甚小，本案事發後雖已經經過十年，對於媒體仍有極大的不滿。換言之，公共化無差別殺人死亡事件是媒體經營的方法之一，但對倖存者的傷害可長可久。

「我很傻眼，其實對這件事，我到現在還耿耿於懷，因為那時候我還抵制了這個 OO 日報，抵制很久，因為我覺得滿氣憤的是，第一個因為是他們第一個來，他們記者先到，記者到警察就到，因為警察其實比較近，然後我不知道救護車怎麼可以這麼久，因為醫院真的很近。」(V3\_501)

「嗯，還一直採訪我妹，我妹那時候也才國小，我說你們再採訪她，試試看。……而且那個隔天頭版，就是（父親屍體）那張照片。……當時 OO 日報就把這個放在頭版，然後那個 OO 聯盟也是把這個放上去，我就說你有沒有想過我們的心情，我說雖然我們小孩可能恢復能力比較大，可是對於長輩那個一觸下去那個回憶是會回來，他們復原沒有那麼快，他們就說那為什麼不叫 OO 報紙先撤？」(V3\_558)

「還有另一個 OO 報紙，就是那時候就是為了要，可能突然經濟沒了，所以就是要募款，然後就去我爸的靈堂前，拍了一張我們三個人的照片，然後他就硬要我們講話，可是其實才高中生，我們能講出什麼東西，我覺得那有點，對，我真的非常感謝當時幫助我們這些社會大眾，可是當時真的要我們說出一句話，我們真的說不出來……」(V3\_569)

媒體與團體利用被害人及倖存者操作類似事件公共化過程，如受訪者所言：以被害人死亡畫面為主，再以倖存者眼淚或矯情為輔，跟隨著各種可以從此死亡中獲利的團體倡議或誇大報導。這是倖存者多年後想要對此事件作一個「了結」的障礙，也是其他私人死亡無可比擬的「不能善了」特質之一。

## 2. 司法能給與不能給的答案

倖存者均表示可以接受司法給予的答案，一旦司法判決後，期待永遠不需再次面對加害人，受訪者 V1 認為司法判處死刑就是公正，不想再與被害人有關連，受訪者 V3 也是這樣的看法。

「其實（法院審理）最終結果我們是可以接受……。也就是說（別的）案子，這幾個人判無期徒刑，甚至以 10 幾年，對一樣受害者家屬來講，以我啦，雖然不是我的案子，但同感身受就覺得說。……臺灣的法律不可思議，……變成沒有一個所謂的法律，所謂的一個正面的一個戒律，一個利害關係就對了，變得說要這個法律幹什麼，以後大家都有仇報仇，有恩報恩就好了，不要訂法律了。……而不是律師去幫他們找一些理由、藉口幫他們脫罪……。」（V1\_488）

「恨嗎？你說沒有恨都是騙人的。但是我那時說尊重司法的一個判決，……對於這些受害者的家屬有一個合理的交代，那時候就覺得司法是公平的。」（V1\_567）

「他們（加害人）可能不知道我們是誰，可是會不會不能保證下一個會不會有這個傷害……我覺得也許死刑，可以不要做到死刑那麼殘忍，至少無期徒刑，但你不要判無期徒刑，過 2 年被減刑，變有期徒刑這樣我們怎麼能接受……他懲罰就是一直關，關到老死，……為什麼他不會死刑？……但為什麼判的方法卻不一樣？……（判決書上）上面沒有寫。（若法官可以跟你們當講清楚判刑的理由）……也許，我們被害人會有些安慰……」（V3\_1230, V3\_1216, V3\_1217, V3\_1218, V3\_1219, V3\_1220）

如果司法有其能與不能的力量，那直接面對加害人，請其解釋，對此不明確死亡事件的解釋是否有幫助？本文詢問受訪者如果有機會跟加害人或其家屬見面講話、質問或釐清事件？三位受訪者均表示不太需要。

「不會……因為再多見、再多解釋都回不來……不用道歉，因為我覺得講出來不一定誠心阿，見面不一定是誠心的話語，反而讓他知道我們到底長什麼樣子。也不想知道他的家人，都已經過那麼多年了。……見面沒有幫助，真的沒有幫助，反而讓他們知道我們長什麼樣子，因為本地就這麼小而已，也滿可怕的。」（V3\_1240, V3\_1250）

「他在開庭的當下什麼都沒有講，他不會講什麼，是後來換了律師之後，之前有 3 個律師，然後 3 個裡面其中有 1 個換了另外一個律師的時候，那一次他就特別說他要跟被害人道歉……我就覺得說你現在道歉有什麼用，然後你又不是真心的，

好像是說對，有一些，只有那一次他有表達這樣的意思，然後其他的時候他都一直一副吊兒啷噹的樣子，然後我就想說為什麼會這樣子。」(V2\_264)

「後來看到他出庭那種態度，兩個眼，好像眼神翻白眼那種吊這樣子，好像從頭到尾一些懺悔之心都沒有，都不知道他自己犯了這麼大的錯誤，都不知道自己犯錯這樣，那時候我們才真的感覺到這個人真的是不能留在世上。因為萬一他這樣子出來一定還會再犯，還會讓其他的無辜受害者再受到傷害，那時候我們才會積極的要求法官要嚴格的判決。」(V1\_559)

受訪者認為參與開庭、判決書都可以使其得到對案件動機、犯罪人等部分瞭解，法院某種程度對此死亡事件提供的版本，仍有其權威性。但縈繞在受訪者心中的共同疑惑，卻是司法無法給予明確回答：「為何有的案件判死刑，有的不判？」「不判死刑，會不會再犯？」、「會不會還有其他類似案件發生？」判死刑，是倖存者再度確認被害人的無辜性，以及被害人是社會治安敗壞的代表犧牲品的認知程序，可以讓倖存者解除疑惑，但留下的矛盾，可能永遠無法有答案。

### 3. 「不要再問為什麼」

受訪者對死亡事件的復原歷程多半依靠自己的非正式支持網絡(如：親友、宗教、志工團體)，其他機關團體、旁人、協助者、治療者或社群媒體過度詢問或關心，反而成了無法「了結」的障礙物，強迫倖存者反覆複習這個永恆的謎題。

「其實怎麼講那時候關懷，還剛開始犯保來做關懷了，一些協助，協助畢竟有限。……」(V1\_582)

「(犯保活動)不會參加，因為怎麼講我本身就要把這件事情沉澱下來，不要說一直要讓人家來做一些關懷，做一些輔導，其實時沒有這個必要。因為會走出去，走出去。沒有走出去，輔導是說增加一些受害者內心上的一些負擔，他們真正需要的是的心靈上、精神上的關懷，而不是年節的關懷。」(V1\_586, V1\_588)

「我就看電視阿，就是讓自己忙碌，就不要吃藥，可是那段時間就常常覺得莫名其妙就會一直哭……我有去看精神科，可是我沒有持續去諮商……。」(V2\_212, V2\_214)

「那時候他（政府）有幫我排一個諮商師，然後我好像有去 3 次，好樣是有時間還是什麼限制，然後後來有去醫院，他好像說做精神評估還什麼，就是他有做一些什麼評估，後來就沒有，他有跟我講說把資源留給需要的人。」(V2\_258)

「其實我覺得比較幸運是當下除了保護協會這邊，然後犯保、家扶中心一直到我們學校教官都很照顧我這邊。」(V3\_38)

「其實像我現在，如果遇到這種事，不會去問到底怎麼發生的，就陪在旁邊就好。……真的不要問太多……對阿，因為當事人也不知道怎麼去講這些事情。」(V3\_754, V3\_758, V3\_760)

「那些心理師、醫師、精神科醫師，對我來說就沒有幫助。……因為我不想在別人面前哭，就會ㄍㄞ住，只要一講話就會哭，那我就ㄍㄞ住不講話，我記得我那時候是都沒講什麼話。……其實像我現在，如果遇到這種事，不會去問到底怎麼發生的，就陪在旁邊就好。」(V3\_1084, V3\_1092, V3\_1094)

官方與旁人協助與關懷，僅因無差別殺人事件本身是罕見又矚目的公共事件，藉由協助或關心事件，可能出於職責、媒體曝光、推廣理念、募款、好奇等，這些無效協助一直存在，但更重要的功能是死亡事件公共化的過程。既然已經是一件公共事件，不存在「私人」死亡議題，須由公共平臺共同定奪。

而本項需求，尚難完全對照 Kruglanski 的五個「落幕的心智開關」概念，因為法律、媒體、他人對於事件的描述都會隨時變動，也超乎倖存者可以控制範圍。雖然倖存者能渴望盡快作一個最後決定，但司法、媒體與他人，豈能如願以償？

## (五)了結後餘燼 — 「A4白紙的聯想」

死亡事件與司法審判後，倖存者各自以自己的方法「了結」事件，往後的時間被工作、投資、照顧長輩或子孫、交友等新的外在事件佔滿。但恐懼的餘燼隨時因相似殺人情境與類似犯罪人出現「復活」，其中兩位受訪者說出了多年來心中的恐懼不安。

「要開庭的時候前幾天就會做惡夢，然後我夢見一個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個很長的隧道，就是一直出不來，然後我又被殺了一次。……然後怕某些人，我記得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在上班，我一定要靠自己，所以我就搭火車，我就看到有一個人拿著 A4 的白紙，我不知道他拿什麼，他就拿這樣子，然後我經過的時候我是這樣，很大的動作跳開來。」(V2\_244)

「我永遠記得我第一次，他們也是第一次跟這邊合作，竟然參觀法院，我傻眼了，第一次當隊輔，然後我第一次在這麼多人面前暴哭。……對，沒辦法，一進來就受不了。」(V3\_697, V3\_699)

「其實事發過後到大學，我忘不了大二那年，因為後來隔壁出租了，我不知道租給誰，但是曾經上到 PTT 上面說我生意就是不好啊，就是因為隔壁有人死掉阿，就講得很難聽，當下我覺得很慶幸的是當時的那個大學學生都幫我們家講話。……我才傻眼，真的是傻眼，看著電腦傻笑，我就覺得為什麼會有這麼智障的是出現在這裡，對阿，都過那麼久怎麼還有人提起這件事。」(V3\_762, V3\_772)

「現在出門時候會害怕，或碰到怪怪的人，一定會，會退很遠，就像去那個廟不是有那種乞丐嗎，我就會離他們超遠，然後曾經有種人被我打過，那個萬聖節的時候不是都會有，就是有那個扮鬼，我都說不要靠近我，他硬要來就被我打，我學長學弟全部傻眼，在 OO，打人，然後那時候我前男友就知道我為什麼……害怕是因為他有血，我還是會有那個陰影在，我只要看到大量的血我就會很害怕，所以我高中我永遠記得我們統測完，我們班在看泰國片，泰國片就是走那種血腥的，我沒辦法，我在外面哭。」(V3\_1181, V3\_1183)

無差別殺人事件「了結」後，受訪者的恐懼總是在不經意的時空人事物突然跳出來，驚嚇倖存者。搭火車、到法院、看電影，乞丐、怪怪的人、一張白紙，一個面具，這些再平凡不過的日常，卻時時讓已經了結之心，再度興起秩序可能被破壞、不預期結果或失去對不明確事物人的安全感。

倖存者的創傷，與 Kruglanski 的五個「落幕的心智開關」是弱相關，Kruglanski 的測量方法似未討論重大事件創傷強弱對於了結認知之影響。



## 四、討論與結論

三位倖存者口述經歷合併超過一百頁，經與 Kruglanski 提出的「了結」與本文提出之「死法」本質的分析框架適配比對後，本文得出兩個結論：倖存者「了結」認知過程及障礙。

### (一) 了結的認知過程

倖存者被踢翻的人生積木，需從三個元素去找回。這個了結的認知過程，環繞著「解答」死亡事件的三個不確定特性流動。第一，要解釋時空不確定性。倖存者需要先解除事件為何在那個平凡的毫無徵兆的時間及地點發生的疑問，本文分析結果顯示，被害人「人生的剛剛好」可以代表三位受訪者的共同回答，既然是被害人的「剛剛好」，也與他人無關。時空未解之謎，暫時可存放於此答案中。第二，要解釋被害人或倖存者責任的不確定性。倖存者如何定調為何是被害人？受訪者用以解釋的是「沒救回來也好」、「為了救別人」、「現場冷靜勇敢的自己」，三種答案看似不同，但均努力賦予「被害人無辜、勇敢」的特質，成功了解除倖存者的內疚與責任。第三，要解釋加害人是誰及其犯罪動機。「那個人」為何要殺人？不論是媒體、司法、倖存者給予「病了、瘋了、腦壞了、反社會人格、也是被害人」等標籤，均有助倖存者卸除重擔，「理性」的瞭解加害人與其動機。如果選擇「道歉都是假的」、「家人怎麼不出來」、「加害人態度差」、「不原諒」、「期待判死刑」，可完成被害人與倖存者免責、犯罪人需負起全責的認知程序。若司法判決死刑，這張「司法保證書」更能釐清不明的殺人事件「真相」。

前述時、地、人的不明確性，因為得到了解答或「真相」，逐步重新塑造秩序感、可預測性以及可操控性、去除模糊不清的元素，以及開啟落幕之心。倖存者隨著時間把這些要素，存放在「了結」的認知結構中，本文也發現三位倖存者均至少平均需要兩年時間，存放的經驗才能略微穩定化，若為被害當事人或目睹者，時間可能還要更久，也更容易出現了結後，不預期的「餘燼」或心理學所謂「制約反應」。

## (二)了結的障礙：一種死亡，多種面貌

不明確的死亡，留下了諸多不明確性，而回應這些不明確性的「真相」，取決於倖存者在認知上，如何重新賦予死亡的明確性。本文發現，無差別殺人犯罪事件中的死亡是公眾事物，與自殺、疾病、意外死亡事件不同，前者不再是私人或家族情事，死亡會被體系與公眾重新加工，找回前述元素「真相」後，倖存者發現拼裝回積木時，部分新積木是司法與媒體等別人給的。

死亡既然公共化，表示其解釋權，可能超過個人自取或自決之手，至少在無差別殺人事件中的死亡，倖存者對死亡的「知識」與「邏輯」的秩序重組，需要依賴司法審判給予「定論」，同時有總有想要寫故事的「千手媒體」或各種團體眈眈在旁，加上官員與旁人的關懷與好奇反覆詢問與倖存者不得不的回應，原來的事件或死亡腳本，可能成為「開放性」腳本(an open script)，任由客體重新編寫，部分積木已非原樣，一種死亡，多種面貌。每個客體製作的積木都有新的「明確性」，使得倖存者本來對死亡可以自我決定的解答，呈現「穩定的浮動」狀態，這也是此類死亡事件「了結」的障礙，是 Kruglanski 學派純粹以個體角度出發的了結概念，遺漏的一環。此外，本文也發現 Kruglanski 對於 closure 五概念中的避免模糊性及 closed-mindedness 之心，較少直接出現在受訪者的口述內容，是否因五概念重疊之故，有待未來研究探索。

## (三)小結

根據本文分解和重組訪談內容後，可以圖 1 說明事件發生到「了結」之過程。圖 1 左邊是事件發生，產出了跟隨著事件諸多的不明確性，破壞了個體認知結構裡之秩序感、可預測性、操控權。而死亡大事，被司法、媒體、官僚、他人公共化，看似公平、明確、透明，卻是倖存者「了結」過程中很不穩定浮動因子，也是了結事件的障礙；此外，個體所受創傷嚴重與持續程度，被個體本身療傷能力影響，若受創傷嚴重或持續時間過長，也會成為了結事件的障礙。圖 1 的最後一組代表，認知從哪裡破壞的，就要從哪裡重建，重建之後，才有落幕之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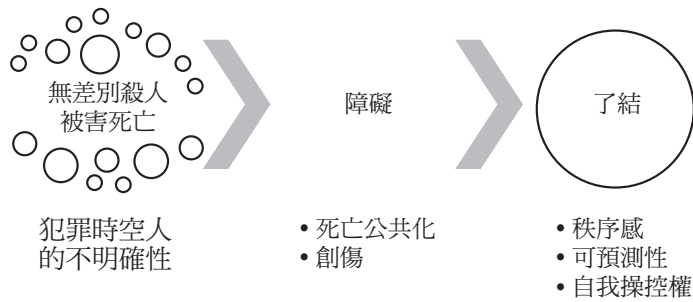


圖 1 無差別殺人死亡事件的發生與了結過程

#### (四) 研究反思(reflexivity)

本文花了三年的時間寫作，終於得到「了結」。回到三年前訪談結束之初，作者試圖分析長達百頁的資料，但不自覺受困於重大犯罪被害人之「創傷、悲傷、損傷」的文獻窠臼中，始終無法賦予這些資料更大的彩澤，反而愈顯黯淡無光而中途停止。原本以為資料辜負了我們，或是我們背叛了資料，卻是我們和資料每天各自向左走，向右走。三年後，在幾乎放棄之間，回頭重新遇見這些看似平凡的口述稿件，資料竟然自動浮現了「了結」的認知結構文本。本文一開始就走入了黑暗的隧道中，忽略了一個重要假設，無差別殺人被害倖存者與其他所有人其實一樣平凡，都有、也需要一套社會生活賴以為生的秩序感、可預測性、操控權。但一起高度不明確的殺人事件，破壞了整個認知體系。其實，受訪者一直透過資料，想要告訴我們，重建這個明確性，是無法僅靠創傷復原、情緒宣洩或損害填補等欺瞞我們腦中的認知結構。「了結」一件重大死亡情事，終需去除此事件中不明確，把被踢散的人事物時空積木重整起來。另一方面，再撿拾重組這些人生積木時，倖存者也可能發現事件已經被司法、媒體與政治公共化，這種死亡的公共化，不斷干擾個體重組認知的「了結」過程，但也可能說明了無差別殺人死亡事件重新拼湊，總不完全是「真相」之本質。

本文受訪者為三名，樣本過少，故全文分析與推論僅屬探索性，未來若能針對無差別殺人的倖存者進行更大樣本的長期追蹤訪談或問卷調查，當可確認此探索的脈絡是否具信度及校度。此外，本文訪談時擬定的訪談大綱時，以探索各種無差別

殺人案件被害人各種議題為主，設定範圍過於廣泛，未來若以「了結」為深度研究課題，將會限縮訪談問題，並以 Kruglanski 的「落幕的心智開關」概念為核心，更為精細的比對，也可提供「了結」量化測量設計時的效度參考。

## 參考文獻

- 小林美佳 (2010)。為什麼會是我：一個受害者想要勇敢告訴你的真相。三采文化。
- 吳建昌 (2016)。從精神衛生及社會經濟政策省思臺灣無差別殺 / 傷人事件之防治。**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26，53-82。
- 吳臺齡 (2017)。從心理病態的脈絡來理解無差別殺人者——以 2014 年臺北捷運大量殺人事件為例。**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27，43-58。
- 李茂生 (2016)。隨機殺人事件的成因與對策初探——一個不可能的任務。**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26，113-124。
- 周儔嫻 (2016)。無差別殺人犯罪：一種罕見而荒謬的暴力型態。**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26，83-112。
- 周儔嫻、李茂生、吳建昌 (2017)。陌生者間（含隨機殺人）之犯罪特性與防治對策研究。法務部法官學院研究報告，計畫編號：PG10601-0403。
- 徐璐 (1998)。暗夜倖存者。平安文化。
- 許春金、蔡田木、葉碧翠、李晉偉、賴慧珊 (2016)。警察機關及一般民眾防處無特定對象殺人事件之研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委託研究報告（未出版）。
- 許福生 (2016) 論建構社會安全之治安維護網——從風險社會下之隨機殺人案談起。**刑事政策與犯罪防治研究專刊**，10，14-24。[https://doi.org/10.6460/CPCP.201610\\_\(10\).0002](https://doi.org/10.6460/CPCP.201610_(10).0002)
- 廖晉賦 (2009)「懷疑」是否夠詐欺罪之「陷於錯誤」：以被害人學理論為心。**刑事法雜誌**，64(3)，99-142。
- 方惠閔、王常怡、吳佳臻、李仰桓、林作逸、林妙嫻、馬萱人、許華倩、黃小奈、陳冠婷、楊剛、楊鎮宇、葉亭君、劉光瑩、劉皓旻、盧映潔、蕭景云、鍾宜芳、蘇子庭 (2016)。隱形的吶喊；犯罪被害人心內話。社團法人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 鄭瑞隆、王世文 (2013)。犯罪被害人家屬服務需求之研究。 *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7，385–438。
- 蘇洵慧 (2020)。 *受害者情結*。平安文化。
- Berenbaum, H., Bredemeier, K., & Thompson, R. (2008).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exploring its dimensionality and associations with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psychopathology and personality.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2, 117–125. <https://doi.org/10.1016/j.janxdis.2007.01.004>
- Bhuptani, P. H., & Messman-Moore, T. L. (2019). Blame and shame in sexual assault. In W. T. O'Donohue & P. A. Schewe (Eds.), *Handbook of sexual assault and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pp. 309–322).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23645-8\\_18](https://doi.org/10.1007/978-3-030-23645-8_18)
- Daigle, L. (2018). *Victimology: The essentials* (2nd Edition). Sage.
- Gillespie, K., King, L., Bostaph, L. & Goodson, A. (2019). Crime victim service providers' needs and barriers: Rurality and “high need”.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15–16), 7274–7297.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9834100>
- Kruglanski, A., Webster, D. & Klerm, A. (1993). Motivated resistance and openness to persuasion in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prior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5(5), 861–876.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5.5.861>
- Kübler-Ross, E. (1970). *On death and dying*. Collier Books/Macmillan Publishing Co.
- Littleton, H., Magee, K. & Axsom, D. (2007). A meta-analysis of self-attributions following three types of trauma: Sexual victimization, illness, and injur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7(3), 515–538. <https://doi.org/10.1111/j.1559-1816.2007.00172.x>
- McGrath, M. (2014).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victimology. In B. E. Turvey (ed.), *Forensic victimology: Examining violent crime victims in investigative and legal contexts* (2<sup>nd</sup> ed.) (pp. 207–251). Academic Press. <https://doi.org/10.1016/B978-0-12-408084-3.00008-9>
- Mendelsohn, B. (1976). Victimology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s trends. *Victimology*, 1(1), 8–28.



- Neff, J., Patterson, M., & Johnson, S. (2012). Meeting the training needs of those who meet the needs of victims: Assessing service providers. *Violence and Victims*, 27, 609–632. <https://doi.org/10.1891/0886-6708.27.4.609>
- Neuberg, S., Judice, T. & West, S. (1997). What the need for closure scale measures and what it does not: Toward differentiating among related epistemic motiv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2(6), 1396–1412.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2.6.1396>
- Park, C. L. (2013). Trauma and meaning making: Converging conceptualizations and emerging evidence. In J. A. Hicks & C. Routledge (Eds.), *The experience of meaning in life: Classical perspectives, emerging themes, and controversies* (pp. 61–76).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https://doi.org/10.1007/978-94-007-6527-6\\_5](https://doi.org/10.1007/978-94-007-6527-6_5)
- Roets, A. & van Hiel, A. (2007). Separating ability from need: Clarifying the 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the need for closure scal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3(2), 266–280.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6294744>
- Roets, A., & van Hiel, A. (2011). Item sele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brief, 15-item version of the Need for Closure Sca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0(1), 90–94.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0.09.004>
- Rosenfeld R. (2014). Understanding Homicide and Aggravated Assault. In Bruinsma G., Weisburd D. (Eds), *Encyclopedia of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pp. 61–63). Springer, New York, NY. [https://doi.org/10.1007/978-1-4614-5690-2\\_692](https://doi.org/10.1007/978-1-4614-5690-2_692)
- Salfati, G. & Canter, D. (1999). Differentiating stranger murders: Profiling offender characteristics from behavioral styles. *Behavior Science Law*, 17, 391–406. [https://doi.org/10.1002/\(SICI\)1099-0798\(199907/09\)17:3<391::AID-BSL352>3.0.CO;2-Z](https://doi.org/10.1002/(SICI)1099-0798(199907/09)17:3<391::AID-BSL352>3.0.CO;2-Z)
- Schafer, S. (1968). The victim and his criminal: A study in functional responsibility, *Random House*, 47, 514–515. <https://doi.org/10.2307/2574587>
- Shoham, S., Knepper, P. & Keft, M. (2010).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victimology*. Boca Raton.

- Tsong, Y., & Ullman, S. (2018). Asian American women sexual assault survivors' choice of coping strategies: The role of post-assault cognitive responses. *Women & Therapy, 41*, 298–315. <https://doi.org/10.1080/02703149.2018.1430340>
- Hentig, H. V. (1948). *The criminal & his victim; studies in the sociobiology of crime*.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ebster, D. & Kruglanski, A. (1994).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6), 1049–1062.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7.6.1049>

# A Death with Multiple Faces? The Cognitive Closure Process in Three Survivors of Indiscriminate Killings

SUSYAN JOU, MAU-SHENG LEE, CHIEN-CHANG WU

**Purpose:** Uncertainty around the time, location, motive, intent, and victim involvement in indiscriminate killing make cognitive closure problematic for survivors. In addition, cases of indiscriminate killing are usually high-profile and subject to a lot of media coverage and official governmental statements as well as a lengthy, complex legal trial. **Method:** We conducted a narrative analysis of transcripts of interviews with 1 male and 2 female survivors (aged around 50, 40, and 15) of different high profile indiscriminate killings in Taiwan. **Results:** Ou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survivors achieved closure on the events in a number of ways: (1) by clarifying the certainty of the crime, victim, and offender; (2) by healing personal/family trauma and death that had been publicized; and (3) by regaining personal power through control over the explanation of their experience as a victim. Obstacles to closure came from the uncertainty surrounding punishment of the offender generated by the legal process, media reporting, and official statements on the case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others. **Conclusion:** Beyond dealing with their own personal interpretation, legal and public versions of the event made closure more complicated for survivor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e need for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se external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gnitive closure needs of the survivors of indiscriminate killing events.

**Key words:** victims, indiscriminate murder, victimology, death, survivor, closure

---

Susyan Jou: Professor, School of Crimin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Mau-Sheng Lee: Professor, Law School,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hien-Chang W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